

## 【论 文】

# 陶希圣与《中国之命运》中的“中华民族”论述<sup>1</sup>

娄贵品<sup>2</sup>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曾在国内外造成很大影响<sup>3</sup>。该书第一章“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及国内各族间关系的观点，被当时的贵州省主席杨森概括为“国族同源”<sup>4</sup>，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蒙藏研究专家黄奋生肯定该书“揭出了新民族政策的历史背景和奠定了新民族政策的坚实基础”<sup>5</sup>，依据的便是这一章。

根据史学界长期流行的“陶希圣代笔《中国之命运》”的说法，这一章的著作权无疑应归陶希圣。但是，近来“陶希圣代笔”说已遭到有力的质疑。李杨的研究指出：“陶希圣对该书的起草和校定、整理起了重要作用，是部分书稿的起草者；在书的立意和观点上，蒋介石提供了思想基础；在内容上，蒋介石的增订、补充部分，远远超过初稿篇幅；在时间上，蒋介石花费的时间并不比陶少，说陶希圣代书《中国之命运》的观点至少是简单化，甚至是不准确的。”<sup>6</sup>尽管学术界对《中国之命运》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水平<sup>7</sup>，但对该书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及国内各族间关系的论述与“代笔”者陶希圣之间的关系，仍尚未给出较有说服力的答案。鉴于这一问题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民国史研究、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蒋介石研究、陶希圣研究中的重要性，笔者拟对该书初版和增订版第一章与陶希圣的关系作一番细致的考察，希望能对该问题的解决有所助益。

## 一、《中国之命运》初版中关于中华民族的论述确实与陶希圣有关

1943年3月10日，《中国之命运》初版<sup>8</sup>出版，蒋氏写道：“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四海之内，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诗经上说：‘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就是说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诗经上又说：‘岂

<sup>1</sup> 本文原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12年6月号。

<sup>2</sup> 作者为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历史系 讲师。

<sup>3</sup> 张宪文、方庆秋主编：《蒋介石全传》，下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页532。

<sup>4</sup> 《自序》，载杨森编著：《贵州边胞风习写真》（贵阳：贵州省政府边胞文化研究会，1947），页2。

<sup>5</sup> 黄奋生：《〈中国之命运〉与新民族政策》，《新中华》，复刊第2卷第2期，1944年2月，页42。

<sup>6</sup> 李杨：《陶希圣与〈中国之命运〉新解》，《中国社会导刊》，2008年第13期，页46。

<sup>7</sup> 参见刘会军：《〈中国之命运〉论析》，《史学集刊》（长春），1994年第3期，页36-40、8；邓野：《蒋介石关于“中国之命运”的命题与国共的两个口号》，《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页84-98；李杨：《陶希圣与〈中国之命运〉新解》，页44-46；《蒋介石与〈中国之命运〉》，《开放时代》，2008年第6期，页39-51；《陶希圣与〈中国之命运〉的历史与解读》，载汤应武主编：《黄埔军校研究》，第四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页211-86。

<sup>8</sup> 据陶希圣所述，1942年12月下旬，“全书的稿子已定，交南岸海棠溪附近之南方印书馆印刷样本二百册”，“分送党中及政府领导及负责人阅读，并请其签注意见。”1943年1月，“百余份意见书集中整理。”2月间，“全稿重加通盘修订，才交正中书局印刷普及本，正式发行。”（参见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潮流与点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页200页。）可见，1942年底印刷的《中国之命运》只能算征求意见稿，1943年3月10日正式出版的《中国之命运》普及本才是初版。



伊异人，昆弟甥舅，’就是说各宗族之间，血统相维之外，还有婚姻的系属。”<sup>1</sup>杨跃进认为，这个解释与陶希圣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所作的论述有相同之处。陶著中的相关论述是，“血统是形成民族的一大自然力；民族是历史上融合的结果。民族是依一定的融合，由言语、地域生活、经济生活及文化的共同性而统一的历史上构成的永续的共同体。”<sup>2</sup>杨跃进因此得出结论：陶的观点溶入了蒋的思想体系中<sup>3</sup>。

然而，只须简单对比，即可发现，这两段话之间的相似程度实在不怎么高，如以此为据，杨氏的结论自然难以令人信服。可是，其结论又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其所举证据不当。其实，最直接的证据仍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中，该书有这样一段话：“本来，周室建国，是以武力克服中国旧来民族之后，分封异姓功臣和同宗子弟，一方面在同宗宗族内，厉行‘本支百世’的组织；一方面于异姓各族间，交互通婚，以组织成亲戚之网……”<sup>4</sup>。陶所谓“在同宗宗族内，厉行‘本支百世’的组织”，与蒋的“诗经上说：‘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就是说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相对应，这一层意思可以概括为“同源论”；而陶所谓“异姓各族间，交互通婚，以组织成亲戚之网”，则与蒋的“诗经上又说：‘岂伊异人，昆弟甥舅，’就是说各宗族之间，血统相维之外，还有婚姻的系属”相合，这一层意思可以概括为“融合论”。这样，蒋所谓“四海之内，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恰好包含了上引《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那段话的两方面意思。

不过，这还不是蒋介石在对中华民族的认识方面吸收陶希圣观点的最早证据。至迟在 1942 年 8 月 27 日，蒋在青海西宁对汉、满、蒙、回、藏各士绅、活佛、阿訇、王公、百千户的演讲中就接受了陶的观点。他在演讲中说<sup>5</sup>：

我们中华民国，是由整个中华民族所建立的，而我们中华民族乃是联合我们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的总名词。我说我们是五个宗族而不说五个民族，就是说我们都是构成中华民族分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样。诗经上说“本支百世。”又说：“岂伊异人，昆弟甥舅。”最足以说明我们中华民族各单位融合一体的性质和关系。我们集许多家族，而成为宗族，更由宗族合成为整个中华民族……

这一段话明显包含了“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这两个方面的意思。可以说，《中国之命运》初版中关于中华民族的论述，与蒋介石 1942 年 8 月 27 日在西宁的演讲是完全一致的。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蒋在这次演讲中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与陶有关。陶并未随蒋考察西北，蒋与其商量撰写《中国之命运》又是在 1942 年 10 月 10 日<sup>6</sup>，如何确定蒋的演讲与陶有关呢？据陶自述，他自 1942 年 2 月返回重庆后，便被蒋任命为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组长，“职务是襄助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先生撰述文稿”<sup>7</sup>。可以判定，蒋在西宁的演讲稿是陶所起草。

必须指出的是，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的相关论述与《中国之命运》中关于中华

<sup>1</sup> 蒋中正：《中国之命运》，普及本（重庆：正中书局，1943），页 2。

<sup>2</sup> 引自杨跃进：《蒋介石幕僚的思想研究》（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页 120。《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于 1929 年 1 月 30 日由新生命书局出版初版，1930 年再版。杨跃进引用的是 1930 年版，本文引用的则是初版。但就本文引述部分而言，两个版本并无多少差异，引用初版对本文结论并无影响。初版原文为：“血统是形成民族的一大自然力，……民族是历史上融合的结果，……民族是依一定的融合过程，由言语、地域生活、经济生活、及文化的共同性而统一的历史上构成的永续的共同体”。参见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上海：新生命书局，1929），页 146、147、148。

<sup>3</sup> 杨跃进：《蒋介石幕僚的思想研究》，页 120。

<sup>4</sup>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页 53。

<sup>5</sup> 蒋介石：〈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福建训练月刊》，第 2 卷第 4 期，1943 年 10 月，页 1。

<sup>6</sup> 参见李杨：《蒋介石与〈中国之命运〉》，页 41。

<sup>7</sup>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页 201。



民族的论述也有不一致甚至矛盾的地方，为何只有这一段写进《中国之命运》呢？如《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明确说明：“中国的民族不是单一的民族，所以中国的文化也不是单一的文化。”<sup>1</sup>而且，这一认识是经过深思熟虑形成的。因为在该书，陶还提出：“中国境内的人民是不是构成了一个民族？……这些重要问题在目前非解答不可，并且问题的解答还影响到革命的基本问题和政策。”<sup>2</sup>将“中国民族是不是单一的民族”作为影响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来考量，可见此问题在陶心目中的重要性，其结论自然不是随意得出来的。此外，在1929年10月发表的《中国之民族及民族问题》一文中，陶又提出了这一问题，并得出“中国的民族还没有健全成立”<sup>3</sup>的结论。这一结论和“中国的民族不是单一的民族”是一致的。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抗战爆发后，陶希圣的认识有了转变，此时他认为中华民族是单一的民族。他在1938年出版的《中国民族战史》中说<sup>4</sup>：

现在中国的民族，除了所谓南方的苗犛獯蛮深入丛山外，所剩的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经过秦汉到现在二千多年的交流融化，彼此间种族的界限已日就消失，形成团结一致的中华民族。在整个中华民族内汉族人数占百分之九七以上，满族仅在东北长白山僻地里尚可找到，为数甚少。蒙古族分布在蒙古及热察绥的北部，文化上大致与汉族合流。回族住在新疆及甘陕二地的较多，除宗教外，几与汉族无异。藏族即历史上的氐羌吐蕃，住在西藏及青海西康一带，中华民族的组合成份虽然复杂，经过悠久的历史糅合，已变分立的五族为统一的中华民族……

这一新认识与《中国之命运》的相关论述并不矛盾。至此，可以得出结论，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初版中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及国内各族间关系的论述，确实与陶希圣有关，但并不完全来源于《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还包括《中国民族战史》。之所以强调初版，是因为《中国之命运》增订版中的相关论述已有改动，其渊源另有所自，杨跃进对此却并无提及。

## 二、《中国之命运》增订版中关于国族同源论的论述与陶希圣无关

1944年1月1日，《中国之命运》增订版出版，扉页上有陈布雷写于1943年12月15日的一段说明，谈到蒋介石对全书重加校订，第一章为重要增订点之一：“本书自今年三月十日开始发行以后，印刷至二百余版。兹经总裁就全书加以校订，交正中书局重制增订版。其重要增订点：（一）为第一章对于中华民族成长之历史说明，有所增益。（二）……”<sup>5</sup>。具体的变动详见表1。

与《中国之命运》初版相比，增订版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及国内各族间关系的论述已有较大的变化<sup>6</sup>，其中最重要的是明确阐述了中华民族同源论的主张。这一主张与陶希圣的观点差异明显。为什么会有这一改动？据铨叙部次长王子壮1943年4月5日的日记，“总裁命令次长以上一

<sup>1</sup>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页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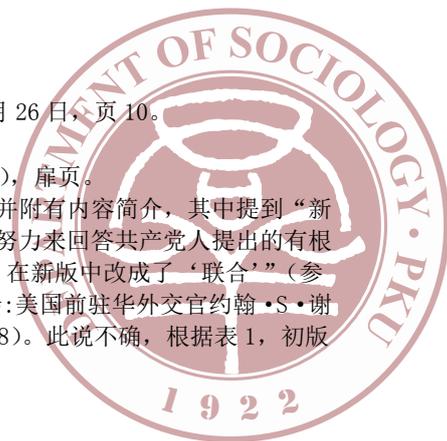
<sup>2</sup>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页145。

<sup>3</sup> 陶希圣：〈中国之民族及民族问题〉，《东方杂志》，26卷第20号，1929年10月26日，页10。

<sup>4</sup> 陶希圣：《中国民族战史》（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1938年），页20-21。

<sup>5</sup> 陈布雷的说明，参见蒋中正：《中国之命运》，增订版（重庆：正中书局，1944），扉页。

<sup>6</sup> 《中国之命运》增订版出版后，谢伟思（John S. Service）译出了一个摘要，并附有内容简介，其中提到“新版中改动的不多，也不重要，某些明显的事实错误改正了，显然只作了很小的努力来回答共产党人提出的有根有据的批评。在谈到汉族扩大对其他民族的控制时，原来用的‘同化’一词，在新版中改成了‘联合’”（参见埃谢里克（Joseph W. Esherick）编著，罗清、赵仲强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页88）。此说不确，根据表1，初版中的“同化”是被改成了“扶持”，而不是“联合”。



律限十日内作读《中国之命运》一书之报告。”<sup>1</sup>据时任军令部部长徐永昌 1943 年 4 月 8 日的日记，“下午在军委会集会，研讨中国之命运一书（蒋先生意）。”“余对于第一章（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以为对中国历史尚有未了了，而忽略汉满蒙回藏大皆炎黄子孙。”“蒋先生忽略了汉以前无所谓汉族，亦忽略了华夷本属一家的事实，及华夷所以分的原委。”<sup>2</sup>徐氏 4 月 22 日的日记又记道：“委员长于军委会所研讨中国命运一书之结论，除对余所拟中华民族长成等意见交王秘书长参考修正外，其余悉不采纳。”<sup>3</sup>《中国之命运》增订版明确阐述中华民族同源论，与徐氏之关系是否真如其所言呢？答案是肯定的。这需要从自古代至抗战时期中国长期流行的民族同源论说起。

表 1 《中国之命运》初版与增订版第一章中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及各族间关系的论述

初版	增订版
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融和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和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在三千年前，我们黄河、长江、黑龙江、珠江诸流域，有多数宗族分布于其间。自五帝以后，文字记载较多，宗族的组织，更班班可考。四海之内，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诗经上说：“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就是说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诗经上又说：“岂伊异人，昆弟甥舅，”就是说各宗族之间，血统相维之外，还有婚姻的系属。古代中国的民族就是这样构成的。	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这多数的宗族，本是一个种族和一个体系的分支，散布于帕米尔高原以东，黄河、淮河、长江、黑龙江、珠江诸流域之间。他们各依其地理环境的差异，而有不同的文化。由于文化的不同，而启族姓的分别。然而五千年来，他们彼此之间，随接触机会之多，与迁徙往复之繁，乃不断相与融和而成为一个民族。但其融和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扶持而不是征服。自五帝以后，文字记载较多，宗族的组织，更班班可考。四海之内，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诗经上说：“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就是说同一血统之内而有大小宗支之分。诗经上又说：“岂伊异人，昆弟甥舅，”就是说各宗族之间，血统相维之外，还有婚姻亲戚的系属。古代中国的民族就是这样构成的。

资料来源：蒋中正：《中国之命运》，普及本（重庆：正中书局，1943 年），页 2；《中国之命运》，增订版（重庆：正中书局，1944 年），页 2。

民族同源论在中国起源甚早，而且影响较大。如谷苞所言：“在中国传统时期的历史人物中，炎黄二帝对后世的影响最大”；“夏、商、周三代是由三个不同的民族建的国家，夏朝和周朝都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汉族和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都认为是炎黄子孙<sup>4</sup>。其实，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不少儒家学者都是坚持民族同源论的。1920 年代，顾颉刚提出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sup>5</sup>，便是针对这种主张。

这种观念在中国古代史上长期存在，且不断发展，成为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为近代民族国家建构及中华民族建构而寻求的认同象征和团结象征。例如 1897 年，知耻学会于北京创立。学会创始人寿富（满族人）著《知耻学会后叙》中有言：“我中国，神明之裔也，尧舜之遗也。”<sup>6</sup>1911 年，贵州南龙桥土司、革命志士安健在《劝滇蜀桂黔诸土司文》中认为：“所谓土者稟姓受氏，

<sup>1</sup> 王子壮：《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八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年），1943 年 4 月 5 日，页 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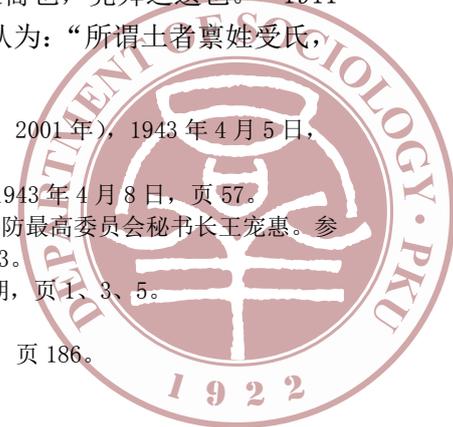
<sup>2</sup> 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七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1943 年 4 月 8 日，页 57。

<sup>3</sup> 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七册，1943 年 4 月 22 日，页 67。王秘书长当指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参见邓野：《蒋介石关于“中国之命运”的命题与国共的两个口号》，页 93，注 3。

<sup>4</sup> 谷苞：《关于如何正确理解炎黄子孙的探索》，《西北民族研究》，1995 年第 2 期，页 1、3、5。

<sup>5</sup>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上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页 14。

<sup>6</sup> 引自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页 186。



孰非黄帝尧舜之子孙。”<sup>1</sup>1912年3月19日，黄兴、刘揆一、马邻翼等发起组织中华民族大同会，呈文孙中山，提到“五族本同一源，尤宜如何痛痒相关，携手而偕之大道，何可稍存歧视之心”<sup>2</sup>。呈文得到孙中山批准<sup>3</sup>。同年5月，经袁世凯授意，姚锡光等发起组织五族国民合进会，其“会启”称：“夫我五族国民原同宗共祖之人，同一血统，所谓父子兄弟之亲也。……综观民族、地理、宗教三者，则我汉、满、蒙、回、藏五族国民，固同一血统、同一支派，同是父子兄弟之俦，无可疑者。”<sup>4</sup>1913年，吴贯因在《五族同化论》中依次论述了满、回、藏、蒙与汉族的关系，认为五族同出一源：“五族之先民其同出一系，既有蛛丝马迹之可寻，今虽风俗习惯各异其趣，然溯厥由来，既同其渊源。”<sup>5</sup>

之后，这种主张还出现在教科书中。191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制)本国史教本》认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同为黄种，其先同出于一原，皆由西而移于东。年远地隔遂相睽异。”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著)本国史》中指出：“世界上的人种，本来是同出一源，不过分支派别之后，各地方的气候不同，那容貌和肤色，也就有些不同了。现在全国的人民，因为移植地点不同，有汉满蒙回藏苗六大族的区别。但是读历史的人，须知虽有六族的名称，却如同一家兄弟”<sup>6</sup>。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组织编辑了《绥蒙辑要》，在题为《中华民族》的开篇说明中，也清楚地写道：“中华民族，都是黄帝子孙。因为受封的地点不同，分散各地，年代悠久，又为气候悬殊，交通阻隔，而有风俗习惯之不同，语言口音之歧异，虽有汉满蒙回藏等之名称，如同张王李赵之区别……”<sup>7</sup>。到抗战时期，这种主张更是赞成者众。据张旭光总结，当时关于中华民族的主张有两派。其中“一派主张，中华民族内之若干支，自古实同一祖先；经过五千年之流转迁徙，种种演变，固曾分为若干不同之名称，迄今尚有一部分各异之痕迹，但追溯有史以来之血统，仍为一元的”<sup>8</sup>。

尤其值得详述的是，在抗战时期，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在学界，持民族同源论的主张者皆大有人在。例如1939年4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上，参政员居励今等提《开发西北与西南先应团结蒙藏回苗夷各族案》，认为“团结蒙藏回苗工作”的首要任务为“宣传”，内容是：“由历史中找出满蒙藏回苗血统相同之根据，向其民众宣传，使我蒙藏回苗同胞，明瞭彼等确为中华民族之一份子，不为外人欺骗与利诱，而自行分化。”<sup>9</sup>在参政员喜饶嘉错于同年6月12日拟呈的《前赴青海视察寺院宣传抗战工作计划概要》中，“宣传要点”的内容之一为“说明我国以往光荣伟大之历史及历代各民族间之关系，以种种事实证明国内各民族系同源分支，与国外民族绝不

<sup>1</sup> 安健：《劝滇蜀桂黔诸土司文》，《民立报》，第十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1911年9月5号，页2127。

<sup>2</sup> 黄兴等：《呈请孙大总统立案文》，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页762。

<sup>3</sup> 孙中山：《批黄兴等呈》，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页331。

<sup>4</sup> 《五族国民合进会启》（1912），载黄彦、李伯新选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398~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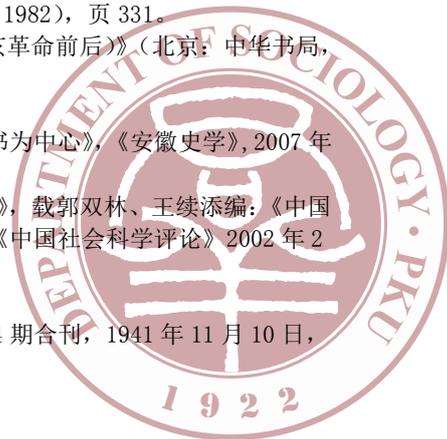
<sup>5</sup> 吴贯英：《五族同化论》，《庸言》，第1卷第9号，1913年4月1日，页3。

<sup>6</sup> 引自刘超：《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安徽史学》，2007年第5期，页65-66。

<sup>7</sup> 引自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载郭双林、王续添编：《中国近代史读本》，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页700。该文原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2月创刊号。

<sup>8</sup> 张旭光：《中华民族发展史纲》（桂林：文化供应社，1942年），页1。

<sup>9</sup> 引自王一影：《泛论边疆夷族青年的教育与训练》，《边政公论》，第1卷第3、4期合刊，1941年11月10日，页100。



相同，申述本党各族平等之真义，以增强其民族意识而固团结”<sup>1</sup>。在约于1941年完成的《教育部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关于改进西南各省边疆教育总建议书》中，“调整边教行政机构”中“编辑工作”的具体工作之一是：“关于特定问题之研究事项，如同源论及民族成因新说等……”<sup>2</sup>。“心理建设”部分所提建议中有“提倡同源说，并努力搜集证据”；在具体阐述时又提出：“按同源论之提倡，不仅为国策，并亦为事实宜然，前贤屡有论列，编者亦略有新证，……其进一步之具体办法，当指定有兴趣有能力之专门学者，就此题范围内加以研究与发挥……”<sup>3</sup>。

1941年7月18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的亲信周昆田被任命为《边政公论》主编及出版主任。8月10日，《边政公论》创刊号出版。在《发刊词》中，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及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这样表述的：“在我边疆广大的区域上，散居着汉满蒙回藏各族的人民，而这各个民族，都为大中华民族之一支系，在初本出一源……”<sup>4</sup>。同期刊出周昆田的《三民主义之边政建设》一文，在论及中华民族的起源及国内各民族间之关系时也说：“就我国民族发展之历史以言，现今所谓汉满蒙回藏诸族云者，在初本出一源，只以所居区域之不同，遂各形成其特殊之语文与风尚。”<sup>5</sup>

由上观之，尽管民族同源论主张在中国起源甚早，在民初还被写入教科书中，抗战时期更是广泛流传，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赞成者都为数不少，但是，《中国之命运》初版中并未予以采纳。1943年9月14日，行政院向各省转发了蒋介石关于民族及边疆问题的代电。蒋在密电中希望国人“了解与注意”：“我国人民有宗族之分支，无种族之区别……古之所谓四夷四裔，固无一而非炎黄子孙，近世所谓满蒙回藏，亦复如此，要皆中华民族也。”<sup>6</sup>这一认识与《中国之命运》初版中的相关论述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不同，而《中国之命运》增订版中的相关论述与此则是一脉相承的。可见，徐永昌所言属实。至于徐的修改意见与当时广为流传的民族同源论有何关系，不得而知。但是，中华民族同源论在抗战时期的广泛流传，当为这一改动营造了有利的历史环境。

基于以上认识，前述杨森将《中国之命运》初版中的相关论述概括为“国族同源”，是不准确的。岛田美和依据《中国之命运》初版，即认为蒋介石的民族论“受到了（抗战时期）同源说和融合论的影响”<sup>7</sup>，也是与历史事实有出入的。“同源论”与“融合论”固然是抗战时期关于中华民族的最重要的两派主张，《中国之命运》初版中的相关表述也确实包含了“同源论”与“融合论”这两方面的意思，但是它们来源于陶希圣的早期著述，而不是抗战时期的相关论述。

前引李杨的研究指出，“陶希圣对该书的起草和校定、整理起了重要作用，是部分书稿的起草者”。由本文所述可知，《中国之命运》初版中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及各族间关系部分，不仅是陶所起草，而且在增订版中也基本得到保留。就这一部分而言，陶确实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尽管陶“代笔”《中国之命运》的说法遭到质疑，但其对该书的影响还是存在的。

<sup>1</sup> 喜饶嘉错：《前赴青海视察寺院宣传抗战工作计划概要》，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页790。

<sup>2</sup> 《教育部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关于改进西南各省边疆教育总建议书》，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页156。

<sup>3</sup> 《教育部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关于改进西南各省边疆教育总建议书》，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页166、167。

<sup>4</sup> 《发刊词》，《边政公论》创刊号，1941年8月10日，页3。

<sup>5</sup> 周昆田：《三民主义之边政建设》，《边政公论》创刊号，1941年8月10日，页8。

<sup>6</sup> 《抄发委员长蒋关于民族及边疆问题代电》，《江西省政府公报》，第1293期，1943年11月16日，页28。

<sup>7</sup> 岛田美和：《抗战时期晋系地方实力派对蒙古族的研究及其宣传工作：以蒙汉同源说为中心》，载涂文学、邓正兵主编：《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页616。

